

“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

追记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徐中玉

蒋彤 本报记者 顾文豪

上海金沙江路南侧的华师大二村，一座座老公寓楼掩映在绿树中，周遭显得格外清幽，楼外红砖白墙，楼内红木楼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年代感。

其中一座公寓的三楼，有些年头的老屋内，如今空空如也，仅剩几件旧家具，木地板上的褐色油漆多处剥落，只有墙面上的几幅相框，述说着居住于此的一位老先生昔日潜心伏案的情景。

2019年6月25日，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徐中玉，在上海逝世，享年105岁。

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

大师仙逝，媒体上涌出如潮水般的悼念文字，格非、南帆等作家写下文章，追忆与老师的种种往事；不曾谋面的年轻人，回忆起第一节大学语文课上就听到先生的名字。

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曾在我国高校中普遍开设。但在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教育学习苏联模式，大学语文课程不再开设，从此中断30年。

当时高校的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严重脱节，大学生普遍存在人文知识匮乏、文化素养缺失的问题。”徐中玉生前曾这样写道。

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徐中玉与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教授等共同倡议，率先在这两所高校恢复大学语文课程。随后，山东大学、杭州大学等一批学校陆续恢复这门课程。

1981年，由徐中玉担任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大学语文》教材出版。这本教材一出版便颇受欢迎，两年时间里，登上了三百多所大专院校的课堂。此后每三五年，便推出新的修订版。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大学语文》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

历次修订，徐中玉都主张精选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主，酌选外国文学精品，“重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熏陶滋润。”

有段时间，一种怀疑、否定过去文化传统的思潮兴起，认为过去的传统有一些表现“民族劣根性的东西”，许多作品“已经陈旧，不必再读”。徐中玉当时“非常气愤”，“十年文革”过去，就有人忘了文革过程中要彻底扫荡过去一切遗产带来的沉痛教训了。在他看来，“不管编哪种大学语文，传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宗旨不能变。”

2018年，《大学语文》第11版发布，年过百岁的徐中玉，仍名列教材主编之首。“你不一定认识他，但一定上过《大学语文》。”一个人的逝世，唤起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在华师大二村，如今空空荡荡的旧屋，过去几十年里却总显得拥挤又热闹。每间房的墙面摆满了书架，无处安放的书甚至“占领”了走廊。

朝南的一间是书房也是课堂，“先生的课堂在家中，每周一次由先生主导所有学生讨论文学话题，借此传授文学知识，锻炼研究思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谭帆，回忆跟着研究生导师徐中玉学习的场景。

徐中玉是大学语文教育领域的灵魂人物，他主编的《大学语文》，30多年来，仅全日制本科教材，就累计发行3000多万册

徐中玉担任华东师大中文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学生可以用创作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成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徐中玉先生在书房。华东师范大学供图

几个研究生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手捧一杯热茶，自由自在地讨论乃至激辩。“先生从不干涉我们的想法，他通常是坐在那把硬木椅上，仔细倾听我们的观点，最后略为点拨，或者做一个引导性的总结，留下让我们自己领悟的空间。”这种自由的课堂，让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南帆至今记忆犹新。

上世纪80年代的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总是拎一个公文包疾步穿过校园。学生眼中，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气很大又非常严肃的老师，以至于南帆每次遇到他“心里未免惴惴的”，谭帆在研究生学习上始终不敢懈怠。

在学术上对学生严格要求，在生活中对学生极尽照顾。南帆还记得，在老师家上课结束后，还能蹭到一顿丰盛的午饭。学生毛时安在追忆文章中写道：“他对我恩重如山，我和他也情同父子。先生一生就想着怎么帮助别人。直到他住院，我们去看他，虽然已经失忆，他还是会说一句，你们找我有什么事。他永远都在想着帮别人做事情。”

徐中玉担任系主任期间，做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规定——鼓励学生写作，学生可以用创作出的作品代替毕业论文，用文学代替学术。学生赵丽宏、王小鹰的毕业论文都是一本诗集。

孙颙、赵丽宏、王小鹰、陈丹燕、格非、南帆、毛时安、陈伯海等，从华东师大中文系走出，日后形成了享誉文坛的“华东师大作家群”，绝非偶然。

“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

徐中玉的大半生，都是在大学里苦读精思度过的。但在学生南帆看来，先生不是那种皓首穷经的书斋型学者，“徐先生的心思很大”。

毕业后的二三十年，南帆常到上海拜见先生，师生闲聊之中，徐先生提到的通常是国计民生的大事，譬如高等教育问题、台海局势、金融危机等，“饮食起居这些琐碎的小事是没有资格成为话题的”。

在其共6卷的《徐中玉文集》中，老先生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作为全书的开篇，他回顾一生遭遇，“忧患意识始终在心中激荡不已”。



1915年，徐中玉出生在江苏江阴沙市镇一个清贫的家庭。5月，对小学时期的徐中玉，有着特殊的仪式感，因为在那个“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了耻辱的“二十一条”。后来，全国的学校将这一天定为国耻日。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五四运动、上海“五卅惨案”、“五三济南惨案”等一连串带有国耻色彩的事件，相继发生在这个不寻常的月份。

在那几天，徐中玉都会走在一群小学生中间，手里举着小旗子，跟着老师们，高喊着小旗上写的口号，花一两个小时沿着不大的华土镇游行一圈。

这个10来岁的小男孩，当时还“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作用”，后来却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愤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有关系的。”

徐中玉在无锡读高中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他便跟着同学跃上前往南京的火车，加入到学生请愿团队伍，听到“攘外必先安内”的旧调而感到失望。他和十多位同学，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受到刊物上带有政论色彩的“小言论”熏陶，他们跑到乡下宣传抗日。

1934年，当完两年小学教师后的徐中玉，考入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辗转到重庆中央大学，最后读了迁到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研究院。

国难当头，受到进步书刊影响的徐中玉，参加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下乡演剧，写抗日文字。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日，他随学校西迁，选择继续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以笔为枪，在重庆只为要求抗日的进步刊物写稿。

此后数十年间，虽颠沛流离、屡遭挫折，徐中玉每每想到青岛的好友们，便“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1984年，年近70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最终“归属于为人民、为

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成长于动荡年代的经历，让徐中玉在毕生的文学创作中，始终心怀国家，“文艺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是他年轻时就开始信奉的观点。

上世纪80年代，初见徐中玉“心里未免惴惴”的南帆，试图从书本里认识这位老师，他看到这样一种文字风格：耿直硬朗，直来直去，不遮掩，不过回，摒除各种理论术语的多余装饰。“我时常觉得，这种文字象征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硬骨头。”

“精神舟楫”

在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珍藏着一张张已经卷边泛黄的卡片，这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另一种特殊象征。

保姆小胡来到华师大二村的老公寓时，徐中玉已是96岁高龄。在她印象中，先生每天坐在那张硬木椅上，身体淹没在一摞一摞的书籍中，静静地看报、剪报、做卡片，直到百岁后精力不济、无法坚持之时。

在国立山东大学受到叶石荪先生的指导，20岁刚出头的徐中玉，开始走上学习文艺理论的道路，终其一生，“新新旧旧都没有离开过文艺理论”。

他自幼跟着钟情旧学的老先生，摇头晃脑朗诵文言文，却不知何以批评鉴赏，终于在叶石荪“文学批评原理”和“文艺心理学”两门课程上发现了新的世界。

对徐中玉来说，那是一段风华正茂的往事，叶石荪参加学生的文学集会，同学生一道到郊外爬山，邀学生到他家谈天，“叶先生给我们看他多年积累下来的大批卡片，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做和怎样做卡片的道理和方法。”

后来，徐中玉读了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彼时学校已迁到云南澄江。在澄江城外荒山上的“斗母阁”，晚上一灯如豆，伴着山野里的呼呼风声，徐中玉夜以继日，心手相抄，积累下上万张卡片，完成了30万字的论文。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徐中玉被划成“右派”，被赶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此后20年间，“在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他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到底没有把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

南帆觉得，读书与卡片，成了先生横渡20年厄运的精神舟楫。

“我很重视搜集之功，也不辞抄撮之劳。如果不能积累尽可能丰富的材料，怎么谈得来研究？”徐中玉生前回忆，40多年来，断断续续手抄写的材料就有两三千万字。

如此扎实的学术功底，使得他日后著述颇丰，涉猎甚广，从苏轼到鲁迅，从古代文学到近现代文学，在文艺学研究上他打通古今，创办我国文艺理论第一个协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为我国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谭帆认为，徐先生的风骨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独善其身，而是积极关照社会现实，有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他十分强调学术的现实性——文艺理论应介入社会现实，在承担社会责任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捐出生平积蓄与藏书

夏日的华师大二村老公寓，红砖白墙与红木楼梯，多年来不曾变样，微风吹来，树叶慵懒地摇曳，时间似乎静止了下来。

一同静止的，还有过去几十年间徐中玉的旧屋。书房里的景象始终没有什么变化，只是一面墙上增添了一台空调机，屋子数载不曾装修。他不在乎生活享受，过着简朴的生活，衣服鞋子破了不舍得扔，一定让保姆小胡拿去补了继续穿。学生们早已熟悉他至真至诚的人格，当这位老教授前些年捐出生平积蓄100万元，设立“中玉教育基金”时，他们都不曾感到惊讶。

徐中玉晚年仍专注学术，在华东师大任教到70岁退休。此后仍担任《文艺理论研究》杂志主编至96岁。谭帆记得，在这期间，徐先生坚持对所有来稿亲自过目、一一筛选，每一期杂志定稿分类、分栏目，他都亲自操刀，不会用电脑，他就一直坚持手抄笔记的方式，复印后分发给各副编审过目。

96岁时，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不再适合出门了，却还惦记着语文教育事业。倔强的老爷子，不顾儿女的劝说，还是最后一次参加了全国大学文艺研究会的年会。

百岁以后，他又把毕生的最大“财富”捐出，5万多册藏书给了校图书馆，数不尽的手稿和卡片给了档案馆。

2014年12月17日，上海大剧院，作为上海文学艺术类的最高奖项，中断12年之久的“上海文学艺术奖”在这里举行颁奖典礼，文学理论家徐中玉、钱谷融、表演艺术家焦菊隐，三位德高望重的大家荣获“终身成就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在起草颁奖词时为徐中玉写道：

一百年追随祖国追随时代追随人民，不离不弃。他敢于担当，勇于直言，深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家国情怀。八十年甘于寂寞，不求闻达，潜心中国古代文论的积累研究，经世致用，融汇古今，特别重视古代创作经验的当代总结，著作等身。始终坚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为推进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建设竭尽全力。仲夏凉夜，如星陨落；斯人已逝，风骨长存。

点燃中国 AI 创新精神的“老顽童”

纪念我国人工智能先驱吴文俊百年诞辰

本报记者 周琳

2017年5月，横空出世的阿尔法狗，让人工智能传遍街头巷尾、童叟皆知。

就在那个5月，我国人工智能的先驱、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方法”创立者吴文俊先生，安静地走完了他自己的一生，享年98岁。

今年5月，13位两院院士以及数十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到上海，纪念吴文俊先生诞辰百年，也为新设立的上海交通大学吴文俊数学中心建言献策。

“他的工作无疑属于上个世纪中国数学赶超国际世界水平标志性的成果。”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这样说：“他亲自点燃了中国人工智能的创新精神”，在唁电中，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写道。

如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从概念走向现实，专利数、投资额、公司量都在全球处于第一梯队。化身浩瀚宇宙中一颗名为“吴文俊星”的小行星，吴先生和他一直倡导的“科学道路上没有便宜可捡”的科学精神，至今指引着这一代的AI人。

终身学习的“老”顽童

“中国有多少数学家投入到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研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日前向“徐匡迪之问”，直击国内人工智能AI发展的要害之处。

而回溯吴文俊先生的一生，则是通过终身学习，开创基础研究新方向的真实写照。吴先生

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9年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随后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任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吴先生于1951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任教职。2000年，他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最早听说吴先生的大名，是在上大学时，同学跟我讲起，中科院数学所有个能人，能够同时左手画圆，右手画方”，当时就觉得这人有点像左手与右手打架的老顽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理学院教师林开亮这样回忆道。

在不少数学家的眼里，之所以说吴文俊先生是数学界的“老顽童”，来自于他永怀幼童的好奇心。用吴先生自己的话说，他喜欢“东看西看”。

他的口述自传里写道：“我是个怎样就怎样的人，想玩就玩，想工作就安安静静地工作，从不多想。读历史书籍、看历史电影帮助我的学术研究；看围棋比赛，更培养了我的全局观念和战略眼光”。

他所说的“东看西看”，大约等同于在年近花甲之际，从零开始自学计算机编程。“在从事机器证明初期，没有计算机可以使用，为了验证其方法的有效性，吴文俊对上千项的多项式进行笔算，常常持续多日”。

吴文俊先生从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中获得启发，提出了用计算机证明几何定理的方法，该方法在科技文献中被称为“吴方法”。这一工作被认为是自动推理领域的一个里程碑，让他获得了国际自动推理学会最高奖。

“机械化，贯穿中国古代数学的思想是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就是构造性和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是着重解决实际问题，它的方法是机



▲吴文俊院士(2014年5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械的，跟西方数学的证明不一样，灵机一动什么的。这是我的发现，这是我真正读懂了中国古代数学”。吴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说。

他的不少学生回忆说，吴先生一直在教学中强调，做研究工作，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方向，不要老是跟着别人做。而他自己开创的数

学机械化研究，就是中国人自己的方向、自己的思想。

“科学就该实实在在的，对就对，错就错，这是最起码的科学态度。不是有个笑话吗，选医生的时候要选他背后的鬼最多的那位。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便宜可捡，没有廉价的成果，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先生说。

为人工智能“原创精神”持续发声

“机器的出现延伸了人的体力，而现代计算机的出现则延伸了人的脑力。”

吴文俊先生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先驱之一。1988年12月，国际“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杂志”第37卷出版几何推理专辑，所发表的文章很大程度上是由吴先生的开创性工作引发的，代表了当时几何定理自动证明的最高研究水平，其中有三篇国外学者的文章专门介绍了“吴方法”的原理和应用成果。

在这之后的一个夏日，图灵奖得主、有着“人工智能之父”称号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特意造访吴先生，在其中关村的宿舍，交流他们对人工智能发展前景的看法。

在人工智能尚未引发如火如荼的热潮之时，吴先生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中国人工智能行业的未来发展打Call。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秘书长余有成回忆道，2009年1月19日上午，他和多位AI方面的学者一起拜访吴先生，当面介绍了申请设立“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的想法，以激励广大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的情况。当时吴先

生就说，“设立这个奖项并不是要个人树碑立传，要通过设立和评奖引导我国广大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工作者，具有明确的创新方向和建立有力的创新激励”。

此后，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起设立的该奖项获科技部核准批复。“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吴先生时，他感慨道，这要感谢党和政府对发展人工智能的重视。”余有成说。

如今，经过多年发展，“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奖”表彰奖励的范围已从前沿基础研究成果和重大技术突破开始向金融、教育、服务、工业、军事及社会治理等科学、应用领域辐射，在社会各界拥有广泛声誉和影响力，继承了吴文俊对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的期望与寄托。

曾任两届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发展中国家工程技术科学院院士的钟义信向记者说了这样一则小故事：当时，自己希望在国际学术大会上提出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对AI行业50年的总结和报告。吴先生说，很好，“机制”应当比“结构、功能、行为”更击中人工智能的要害，“我们的人工智能的研究不要总是跟着别人跑，一定要走出新的路子！50年是一个关口，应当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规划。”

2016年2月13日，余有成再次到吴先生家中拜年。那时已97岁高龄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手扶木质拐杖，神采奕奕，脸上洋溢着他一惯常有的质朴和纯真的笑容。

临别之际，吴先生欣然题词：“发展人工智能，引领时代前沿”，寄语我国从事人工智能领域的科技工作者，不能走外国人的老路子，要在原创科学及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突破，在智能科学技术应用领域全面发展。